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国食药安全促进会三农工作委员会

三农工作通讯

2025 年第 3 期（总第 423 期）

2025 年 3 月 5 日

---

|                                     |         |
|-------------------------------------|---------|
| ◆ 浅议乡村振兴主体·····                     | 张晓山（1）  |
| ◆ 慢半拍的农村现代化·····                    | 贺雪峰（5）  |
| ◆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特点·····                | 陈锡文（8）  |
| ◆ 现代农业发展宜大则大宜小则小·····               | 涂圣伟（11） |
| ◆ 乡村振兴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周期·····               | 李稻葵（13） |
| ◆ 中国特色乡村产业发展的道路选择·····              | 张红宇（15） |
| ◆ 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 黄承伟（21） |
| ◆ 加强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标准的研究·····             | 贺丽君（24） |
| ◆ 以新产业新业态引领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 刘璐琳（26） |
| ◆ 新中国 75 年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推进····· | 郑有贵（30） |

# 浅议乡村振兴主体

张晓山

时光荏苒，《中国农村经济》不知不觉走过 40 年漫漫长途。40 年来，它筚路蓝缕，始终与改革开放同行，聚焦农业农村农民相关理论、政策、实践所凸显的重大问题，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结出了累累硕果。如果把刊物比作人，那它正值春秋鼎盛。惟愿它能不忘初心，不忘使命，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发表发现真问题、研究真问题的研究成果，做好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成为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要参考、专家学者讨论思考的珍贵依据和青年学子的良师益友。在下一个 40 年，创造更大的辉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和发展实践不断深化，目前中国“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地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此，笔者就乡村振兴主体谈谈自己的认识。

## 一、乡村振兴要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农民自己要振兴。从宏观上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体是广大农民群众；从微观上说，广大农民群众“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下简称《乡村振兴促进法》）第四条明确指出，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维护农民根本利益”。那《乡村振兴促进法》起什么作用呢？该法共 10 章 74 条，据粗略统计，74 条中，作为主语，“国家”一词的出现频次最高，出现 52 次；其次是“各级人民政府”，出现 35 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出现 7 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出现 10 次。总体上看，《乡村振兴促进法》主要规范的是政府行为。这是一部明确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对促进乡村振兴所负法定责任的综合性法律（张晓山，2021）。它是确保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法治保障，是国家意志、国家战略在“三农”领域的最高体现。这部法律的关键是明确国家和各级人民政府在乡村振兴中要起到促进作用，而不是起到替代主体的作用，要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

## 二、外出农民工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不可能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区域性经济组织”，必然有一部分成员在区域外工作、生活，这部分成员

就是外出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3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9753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7658 万人，比上年增加 468 万人，增长 2.7%；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 12816 万人。中国农民工具有身份的二重性，他们既是农民，又是工人。按照所从事的职业来说，他们是工人。但他们的户籍在农村，绝大多数人在家乡有承包地、宅基地以及建在宅基地上的房子。他们又具备资格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土地是中国农民工与乡村维系关系的“脐带”。这是他们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外出务工的农民之间存在的本质差别。这使中国的二元结构不是发展经济学所说的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二元结构，而是中国特有的经济社会二元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在农民工问题上的焦点是外出农民工中的主要部分——进城农民工。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条件下，外出农民进城打工，大多数是边缘性、钟摆型的流动人口，较低的工资使大部分农民工无法支付定居成本，实现不了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城市的长久性迁移，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和消费方式与城市居民仍有较大差距（张晓山，2003）。这样的城镇化依旧固化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城镇化。

总体来看，世界城镇化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城镇化速度要经历先加速后减速的变化。统计数据显示，1996—2020 年是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期，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4 个百分点；2021—2023 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约 0.76 个百分点。中国城镇化放缓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城镇化进程越来越慢，但其潜力还没有挖掘出来。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之所以越来越慢，表面的原因是城镇化比例已经很高，而更深层次的内因在于，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拖累了城镇化的进程。如果以常住人口来计算城镇化率，2023 年末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66.16%，但是，以户籍人口来计算城镇化率，则只有 48.3%。这中间将近有 18 个百分点的缺口，就是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由于户籍不同而形成的身份差别。由于中国大城市的户籍身份绑定了许多社会资源，比如教育、就业、养老、医保、购房购车指标等，这就形成了城市人与农民、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双重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农民已成为异质性强的群体，他们的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态势，所以，农民的经济保障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不同的产业形式必然导致不同的经济保障形式。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者，情况各不相同。即使同为进城农民工，在正规企业就业、灵活就业和间歇性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情况也大相径庭。为解决现实问题，应逐步将进城农民工、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职工等区分不同情况、分门别类地纳入城市的社会保障网络之中（张晓山，2003）。最终的目标是，不论正规就业与否、不论性别、不论工种，对城市居民和农民（包括农民工）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实现城乡一体化。

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不仅意味着将更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转移出来，而且意味着逐渐将已经转移出来的相当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真正纳入城市体系之中，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和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这部分人口才能真正割断他们与农村土地之间的“脐带”，小规模兼业农户的逐渐消退、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国式现代农业才真正有可能实现。当然，小农户何时退出历史舞台取决于政策的导向与落实、各类农民群体的具体情况以及社会发展规律。不过，上亿进城农民工如果能享受与城市居民一致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得以提升，他们在医疗、

卫生、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方面的负担就能相应减轻。减负等于增收。收入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净收入增量就能转化为生产和生活消费，成为促进国内市场的强劲动力。促进房地产业良性运行、第三产业繁荣兴旺，以农民工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进程才能健康发展。但绝大部分外出农民工有可能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动力，不太可能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

### 三、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在乡村工作与生活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非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在第十一条讲到何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时，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二条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笔者认为，这里指的是经营自家承包耕地的普通农户、转包他人农地的承包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主。这些多元化的经营主体构成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框架中发展壮大的，它与多种所有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育相辅相成、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在农村，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集体经济），也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农村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而最重要的鼓励与支持就是尊重和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解放生产力。

要保证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就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清除阻碍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重塑城乡关系。这就意味着不仅仅是农村的要素要流向城市，城市的先进要素（包括资金、技术、管理）以及城市的优质资源（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也要流向农村（张晓山，2021）。打破农村社区封闭的格局，形成城乡资源要素良性互动的局面。这是乡村振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城乡资源要素良性互动，首先涉及村民的股份、产权等问题。习近平 2017 年 12 月指出，“过去，一些农村集体资产产权虚置，经营收益不清、分配不公开，农民群众意见很大，滋生了一些‘微腐败’。要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开展清产核资，进行身份确认、股份量化，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2016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组织实施好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改革试点”。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鼓励以出租、合作开发、入股经营等方式盘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在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基础上，改造农村、发展中国式的现代农业，不能仅靠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儿童，必须引进先进生产要素。要支持进城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现代农业和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鼓励高校毕业生、企业主、农业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等各类人才回乡下乡创业创新，将现代科技、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引入农村。”从城市下乡的要素需要与农村的要素有机结合起来。乡村振兴需要人才。一些地区当地的公司或合伙企业以及当地回到家乡的外出创业企业家投资农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在企业家自身受益的同时，还能带动农民增加收入、增强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最终促进当地社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经济现象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但社会资本投资农业是一把

“双刃剑”，乡村发展不能形成“新圈地热”，不能成为资本的盛宴。习近平指出，“关键是完善利益联结机制，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乡村振兴的成果必须由农民共享。改变资源要素的配置，应伴随实现利益格局的相对均衡。让农民群众合法合理地分享乡村振兴的成果，应该成为基本前提（张晓山，2021）。今后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是：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即在要素开放流动的农村产权格局下，如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需要探索出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真正落实农民政治上的民主权利，保障他们的财产权利。最终，村民自身能成为资源和部分资本的所有者；村集体领导人作为集体成员的代理人，接受集体成员的监督；集体经济组织成为社会资本较为平等的合作伙伴，在农村形成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和较为均衡的利益格局（张晓山，2021）。

乡村振兴要培养一大批以农业为职业、占有一定的资源、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具有一定的资金投入能力、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新型农民，不断增强现代农业发展活力。在中国，一批新生代农民坚守农业或回归农业，他们接老一辈的班，自称“农二代”“果二代”“棚二代”。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年轻农民赤手空拳不可能将农业做大做强。但他们具备了应有的条件：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基本上掌握科学技术、信息渠道疏通、销售渠道已建立、品牌在市场上基本立足、资金基本上没有问题。他们有可能成为乡村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和人才基础。

乡村振兴要培育内生动力，首先是培育领头人。必须通过可行的措施，培养和造就一批本土化和专业化的人才。实践证明，扶智与扶志的重点是当地农民群众的带头人。群众的主体意识是逐步形成的，首先是在少数先进分子身上逐步形成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是宣传队、播种机、催化剂。群众主体意识的发育也需要外部力量的帮助和培植（张晓山，2018）。相当一批本乡本土外出务工创业的人士，他们或是本区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当地的土专家、技术能手、接地气的专业型人才，也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能接受新生事物，勇于创新，是新时代农民的缩影；或是来自其他区域，成为本区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非成员。他们经历过市场经济风雨的洗礼，开阔了眼界，积累了资本，逐渐具备不断试验、勇于探索的企业家精神，具备了相应的知识、能力和技能。给他们提供适当条件，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打造能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鼓励他们返乡带领乡亲们发展产业，他们就有可能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催化剂和播种机（张晓山，2018）。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做农业首要是有情怀，要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但农业不是光靠情怀就能做出来的。近年来，通过政策引导和创造相应的制度环境，农村基层已经涌现出一些创新型本土化人才。他们有发展事业的志向和道德情操，能带动广大农民群众自力更生，共同分享乡村振兴政策的红利。这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发展现代农业的根基，是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深厚的底蕴（张晓山，2018）。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乡村发现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25年第1期）

# 慢半拍的农村现代化

贺雪峰

## 编者按：

关于乡村振兴、现代化的问题不断被媒体提及，但如何从具体的人出发，去讨论农业农村的现代化问题，仍然比较稀缺。

在这个方面，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贺雪峰老师的《慢半拍的农村现代化》，弥补了这方面的稀缺和不足。该文特别提到，乡村振兴不是要为城市中产阶级和文青小资提供休闲去处，而是要为缺少城市就业机会及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农民提供农业收入就业，提供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目中无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排斥农民的乡村振兴，必须坚决制止。一个也许不是很现代但对弱势农民友好的农业和农村，是中国现代化中的大幸！

—

当前正在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在地方实践中容易变成战术问题。地方官员普遍希望立竿见影，短期就推动农村实现现代化。中国地域广大，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中国现代化必然是一个艰难曲折过程，很难仅仅通过几个战术动作就可以实现现代化。

毛主席说，任何事物都存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到中国现代化上来，当前时期，虽然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短板，当前中国现代化中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却在城市而不在乡村。

当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两个主要矛盾，第一个主要矛盾是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只有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突破西方科技卡脖子工程，在产业价值链上不断攀升，从主要靠消耗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环境资源来获得增长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来获得发展升级，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依托“中国智造”，第三产业获得快速发展，进城农民才可以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体面收入，也才可以在城市安居。

进城农民在城市安居，他们让渡出农村获利机会，留守农村的农民就可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获取更多收入机会，具有更高生活质量。无论是科技进步、产业升级，还是城市二三产业就业机会，都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民自然会进城以获得这些机会。因此，当前中国现代化的另外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城市化，

就是农民进城。当前的农民进城，既不稳定也不全面。农民不是一次性进城，也不是全家进城，而有一个很长时期在城乡之间的往返试探，这个往返试探的时间可能长达几十年。农民进城了，他们大都愿意保留农村宅基地、住房和承包地，以防进城失败时可以返回农村。又正因为保留了农村的退路，农民进城就有了安全感，就敢于在城市打拼。农民年轻时进城，年龄大了也可能返回农村。

在当前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城市尤其在于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中国城市产业的成功突围，就可以为进城农民提供大量的在城市里的稳定就业与体面收入，农民就可以在城市安居下来，他们就不再需要保留农村这个退路。农民是否彻底进城不取决于农民的决心，而取决于城市可以为农民提供多少机会。现阶段，城市显然无法为所有进城农民提供足够机会，农民也就必然要保持农村退路，就要在城乡之间往返，就不会随意退出宅基地和承包地，就要在城乡两头都占有土地资源。

## 二

从总体上讲，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城市不断扩张，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并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就有越来越多进城农民不再需要农村这个退路。具体到每个农户家庭，他们进城是否顺利，却仍然有很大不确定性，这既取功于他们个人努力，又要看运气。城市提供的机会越多，进城农民机会就越多，运气就不会差。即使少数进城农民运气差，国家也比较容易提供社会保障的兜底。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是否进城，如何择业，是否买房，及在哪里买房，以及是否退出农村，这得由农民自己判断，他们要对自己的判断负责。无论如何，在目前阶段，城市无法为所有农民提供足以让他们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机会，保留农村退路对进城农民很重要。也是因此，绝对不应该有一个政策，强行割断进城农民与农村的联系，绝对不应当借口进城农民在城乡两头占地，试图收回农民宅基地和承包地。

当前有一股十分强烈的呼声，说农民进城了，农村宅基地数量不减反增，这不正常，从而希望通过各种办法来限制农民的两头占地。还有一些地方通过强迫农民上楼来腾退农民宅基地。更有一种声音认为，只有当城市资本与城市市民下乡而农民进城，才可以缓解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是，城市市民下乡最多只是多一个看星星看月亮的地方，进城农民若在城市无法获得稳定就业，他们就只能在城市漂泊流浪。

农民是中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缺少在城市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农民中还有弱势群体。在当前中国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首先需要基本保障，只有有了基本保障，他们才能追求更加体面的高质量生活。

无论是农业农村现代化，还是乡村振兴，都首先应当是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和农民中的弱势群体的现

代化和乡村振兴，任何将农民排除在外、驱赶进城的乡村振兴，都是本末倒置的，都是错误的。乡村振兴不是要为城市中产阶级和文青小资提供休闲去处，而是要为缺少城市就业机会及难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农民提供农业收入就业，提供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目中无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排斥农民的乡村振兴，必须坚决制止。一个也许不是很现代但对弱势农民友好的农业和农村，是中国现代化中的大幸！

允许农村现代化比城市慢半拍，让农村农业现代化等一等中国农民，让具有主体性创造性和对自己负责的农民自己决定进城还是返路，给他们足够多的时间在城乡之间往返，允许农民“进可攻、退可守”，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一直顺利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完全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三

当前正处于农民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关系正在重组，农村社会结构正在巨变，这个时候，试图通过规划和建议来将农村固定下来，是不可能的任务。

有一种观点认为，之所以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是为了缓解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然而，城乡也许并没有一般想象的那么不平衡，因为农村有着大量自然经济的因素，即使收入少也可以有相对比较高的福利。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城市向农民开放了几乎所有机会，而国家限制城市资本下乡占有农民的生存资源，因此，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保护型结构，正是在这个保护性结构下面，农民一方面以农村作为基本保障与保底，一方面又进城务工经商，获取城市发展机会。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不一定非得是在农村。实际上，农民没有“乡愁”而只有“城愁”，他们期待进城，他们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立在从城市获利的机会上，且他们是通过辛勤劳动来实现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很努力，不求不等不靠不要，而是努力劳动与创造。反过来，倒是城市中产阶级和文人小资希望通过到农村建别墅来看星星看月亮，从而同时拥有城市机会与农村恬然生活。

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只是农民的保底，他们正在从城市获取各种机会，正在进城，他们正通过自己努力实现在城市的美好生活。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能在农村顺利完成劳动力再生产，而不是被迫进城却难以安居。他们不愿成为漂泊流浪在城市无家可归的人。

农村改革慢半拍，农村发展与现代化慢半拍，将国家主要资源集中到中国现代化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搞现代化的齐步走，等一等农民，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很重要。

这个慢半拍的半拍时间，大概为十五年。

**（作者：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是“华中乡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来源：公众号新乡土，一早读书 2025 年 01 月 11 日 06:59 河南）**



#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特点

陈锡文

热烈祝贺《中国农村经济》杂志迎来创刊 40 周年！40 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主办下，《中国农村经济》杂志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追求卓越，砥砺前行；学术为本，观照现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办刊理念，编辑发表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在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研究、交流中国“三农”工作的实践经验、为国家制定“三农”政策提供咨询服务等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经济管理类学术期刊和经济类学术期刊中的翘楚。在此，向为取得这样骄人业绩而付出辛勤劳动的《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的编辑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重申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在改革中形成的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一项将中国资源禀赋、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历史文化背景和农业产业特点等因素融为一体而形成的制度，是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也是农村改革所取得的一项重大制度性成果。党的十九大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习近平将其具体阐述为：“明确再延长土地承包期三十年，从农村改革之初的第一轮土地承包算起，土地承包关系将保持稳定长达七十五年，既体现长久不变的政策要求，又在时间节点上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相契合。”为此，中国的农业经济理论研究，应当继续为巩固和完善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有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

第一，是一项坚守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形成，以中国农村中更具基础性作用的三项制度为前提。这三项制度是：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行使集体所有权的制度、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平等的制度。显然，只有将上述三项制度作为前提，才能形成农村集体的土地由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来承包经营的制度，才能避免“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流于“空口号”，而使其具有扎实、牢靠的制度性基础。因此，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行使集体所有权的制度和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平等的制度。

第二，是一项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制度。这是基于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农情的实事求是的安排。在这一制度下，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配所遵循的原则是：只向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的农户家庭这一法定主体发包，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平等。只有坚持这两个原则，才能保证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全国所有的农民都能户户有地种、家家有房住、人人有饭吃，保证在农业资源占有方面不发生两极分化现象。这对于在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都极为重要。2020年12月28日，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应对风险挑战，不仅要稳住农业这一块，还要稳住农村这一头。经济一有波动，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农民工。二〇〇八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二千多万农民工返乡。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下行影响，一度有近三千万农民工留乡返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大局能够保持稳定，没有出什么乱子，关键是农民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即使不回去心里也踏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民在城里没有彻底扎根之前，不要急着断了他们在农村的后路，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这就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特色，也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由此可见，土地承包经营权对于农民的公平性有多么重要。

但这项制度也绝不是只讲公平不讲效率。从改革之初提出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权与农户家庭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到进一步提出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就是为了在新形势下“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引入市场机制来优化配置已经承包到户的土地经营权，通过允许农户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承包地的经营权，提高农业经营效率。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说到底，要以不变应万变，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不变，来适应土地经营权流转、农业经营方式的多样化，推动提高农业生产经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更加充满持久的制度活力。”

第三，这项制度有着广泛的适应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一方面，1978年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到2023年底，中国乡村常住人口已减至4.77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3.84%。但经营自家承包地的农户仍占大多数，他们仍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基本面。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面积在不断扩大。截至2021年底，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5.57亿亩，占承包地总面积的35.4%。这就催生了一大批以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了一定面积的土地经营权，并不等于就能够实现有效率的规模经营。例如，截至2023年10月末，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近400万个，场均种粮面积148.8亩，这显然仍难以适应现代农业技术装备的作业要求。中国农业实现有效率的规模经营，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农业社会化服务应运而生。2022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达73.11%，其中小麦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97.55%，已接近100%。但这并不是农业经营者都自行购置了农业技术装备的结果，而主要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作用发挥。2017—2023年，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体从22.7万个增长到109.4万个，服务所覆盖的农户从3655.8万户扩大到9400多万户，服务面积从2.3亿亩次增加到21.4亿亩次。

应当看到，中国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目前仍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进程中。所以，不仅是经营自家承包地的农户需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绝大多数转入一定土地经营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样离不开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或是购买他人提供的农业技术装备服务，或是利用自身购置的农业技术装备为他人提供服务。但无论是哪种形式，都明显优化了土地经营规模与农业技术装备之间的配置关系，实现了农业经营的节本增效。因此，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的规模经营与通过社会化服务扩大现代农业技术装备作业空间的规模经营，都将是推动中国农业逐步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而这两者的结合，则效果更为明显。这也表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不排斥农业规模经营。相反，得益于“三权分置”的制度创新，这一制度能够容纳从农户到各类新型主体的多种农业规模经营。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于其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服务形式的多样化，也能够满足多种规模的农业经营主体的需要。目前，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有服务专业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供销社和其他涉农企业等；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形式，既有托管式的全程服务，也有菜单式的选项服务，还有随叫随到的专项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业之所以方兴未艾，就在于它能够在土地经营规模不足的条件下，通过服务来扩大农业技术装备的作业规模，进而提升农业经营的整体效率，从而实现小规模土地经营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三权分置”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自我完善。实行“三权分置”，既在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引导有条件的农户将所承包土地的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地流转和集中，以发展土地经营规模逐步扩大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又通过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土地经营规模大小不一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经济、便捷、高效的各类生产性服务。这两方面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动着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稳步发展。2024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跨上了7000亿千克的新台阶，这比1978年的超3000亿千克增长了约130%。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由于其自身的不断创新和完善，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效制度。

当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在落实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也面临着不少来自外部的挑战，因此，才要在巩固的基础上不断加以完善。希望《中国农村经济》杂志能进一步引导学术界对这一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基石”的重要制度给予更多关注，在理论上进行更深入的总结和概括，在学理上给予更清晰的分析和阐述，从而赋予它在中国特色农业经济学中的应有地位。

**（作者：陈锡文，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自1988年第1期起历任《中国农村经济》编委、顾问。转自：《中国农村经济》2025年第1期）**

# 现代农业发展宜大则大宜小则小

涂圣伟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指出：“无论是零星种植，还是规模化经营，关键是提高生产力。现代农业发展宜大则大、宜小则小。”这一重要论述充分说明了现代农业发展没有固定模式，只要是符合资源禀赋条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模式，就是适宜的和有生命力的。

生产经营规模“大”与“小”并存，将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长期历史现象。我国各地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很大、农业生产条件各有不同，发展现代农业不应该只有一个模式，农业经营规模宜大则大、宜小则小符合客观实际。我国人多地少，“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很多丘陵山区地块零散，短时间内无法全面实行规模化经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实现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同时，我国当前的农业生产经营格局形成已久，要改变传统分散的农业经营方式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时间和条件，不能操之过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小农户仍然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面，这是发展现代农业必须长期面对的现实。但是，如果不发展规模化经营，完全依靠分散的、超小规模经营来推进农业现代化，也是不现实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仍然是发展的重要方向。这就意味着，“大”与“小”的农业经营形态将长期并存，小农户与规模经营主体将长期存续，并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各自不同的重要作用。

实践看，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大有大的优势、小有小的适应性。在一些适宜地区，规模化经营有利于推进农业标准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生产，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在一些不适宜进行规模化生产的地区和条件下，小规模种植养殖仍然是重要的生产方式。虽然规模有限，但通过采取小而精、特而优的发展模式，依然可以满足特定市场需求；通过现代营销手段，也能直接对接大市场，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此外，小规模种植养殖还可以充分利用边角地、闲置地等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

推进农业现代化，在生产经营规模上既要发展“大”，也不能忽视甚至排斥“小”，要把“大”和“小”统筹衔接起来。既不能因为小规模家庭经营是长期的基本面而否认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必要性，也不能因为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趋势而将小规模经营排斥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之外。必须正确处理

发展“大”和扶持“小”的关系，既要把准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的前进方向，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挥其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也要认清小农户家庭经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国农业基本经营形态的国情农情，完善针对小农户的扶持政策，广泛开展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的能力，加快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不论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是大还是小，关键是提高生产力。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是检验生产方式是否科学合理的试金石。无论是规模化经营还是小规模经营，关键要看有没有效率、能不能创造价值、可不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要强化先进经营管理理念、现代生产要素、适宜生产技术模式的引入，促进不同规模经营主体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特别是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使小农户适应和容纳不同生产力水平，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不掉队。

不论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是大还是小，都要以市场为导向。现代意义上的农业经济已经不是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经济活动直接或间接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在推动农业生产要素流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再是小而全的经营者，而是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者。不论是小规模种植养殖，还是规模化经营，生产经营活动都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特色资源，优化生产结构，加强市场紧缺和适销对路优质农产品生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

振兴乡村，小农生产与现代化大农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只有坚持宜大则大、宜小则小，既不盲目追求大规模，也不固守小规模，将小规模生产和规模化经营的优势结合起来，农业现代化才能蹄疾步稳。

**（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及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农村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文章来源：人民网）**

# 乡村振兴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周期

李稻葵

应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关键作用，并聚焦人的全面发展。建议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农村经营体制改革，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 一、中国经济潜力与挑战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然而，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状态尚未达到应有的增长潜力，主要是受到内需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等内部问题的制约。同时，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地缘政治风险增加，也对中国经济构成挑战。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工业化、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推动增长。这一模式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导致资源配置不均和环境压力增大等问题。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亟需调整。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应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提升居民消费水平。通过城镇化进程和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可以释放巨大的经济潜力。可以考虑通过发行国债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并调整政策以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转向关注人的幸福感和消费需求，以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 二、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关键作用

首先，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农业现代化。这不仅是应对经济挑战的途径，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一是引入精准农业、智能灌溉和无人机监测等先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减少资源浪费，增强国际竞争力。二是优化农业生产结构，通过科学规划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广绿色农业，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提升农产品的安全性和市场竞争力。三是完善基础设施，如道路、水利、电力和通信网络，为农业科技的应用提供支持，提升生产稳定性和市场响应速度。

其次，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许多农村人口已经在城市工作，但他们的家庭仍留在农村。通过政策支持，帮助这些人在城市安家落户，将极大地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消费能力。这不

仅有助于个人幸福感的提升，也将带动整体经济的增长。实现农村人口的城镇化，需要一系列支持措施：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提供资金支持，帮助农村人口在城市定居；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可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有序流动，缓解农村就业压力，也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最后，实现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支持。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如发行国债、调整财政预算，确保充足的资金投入农村发展中。另一方面，资金的使用需要精细化管理，确保投入到最需要的领域，例如提供住房补贴、教育资助和医疗保障等，确保农村人口在城市生活的稳定性和舒适度。此外，还可以通过税收优惠和金融支持，鼓励企业投资于农村地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 三、以人为本与思想解放

第一，政策制定应尊重人民意愿，特别关注农民生活条件和收入水平的改善，以增强消费能力，推动内需增长。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要求政府在经济政策中优先考虑人民的福祉，通过改善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公共服务，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强消费信心。通过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效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合理规划人口布局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通过政策创新，鼓励城乡融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应对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发展城市群和都市圈是优化城市功能布局的重要手段，它不仅促进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合理分布，还能通过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同时，支持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推动区域间均衡发展。

第三，通过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增长。深化农业和农村领域的改革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全球竞争力。在绿色农业、生态保护和可再生资源利用方面加大投入，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增长。

**（作者：清华大学中国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本文根据作者在“清华三农论坛 2025”主论坛上的演讲整理，经本人确认并授权）**

# 中国特色乡村产业发展的道路选择

张红宇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产业促进乡村发展，核心是实现农业稳产保供，农民就业增收，农村可持续发展，赋予了中国特色乡村产业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

## 一、乡村产业具有鲜明的中国内涵

纵观全球农业发展史，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世界各国农业产值所占份额都表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非但没有削弱，反而被赋予更多的功能要求。各个国家纷纷通过提高农业产出，实现保障食品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以确保国民经济其它产业健康运行等多重目标，强化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其理由就是认为农业具有多重功能。这种多重功能是指现代农业除了具有生产食物等农产品这一主要和传统的经济功能外，同时还具有其他社会、文化和环境方面的非经济功能，比如包括保障农民就业，保护生态环境，传承农耕文化，生物多样性，保持社会活力等。这种非经济功能的区域空间载体极大地拓展了农业产业边界，乡村产业的概念由此生成发展。基于中国的国情和农情，在全球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之下，乡村产业具有了鲜明的中国内涵。

——阶段性。乡村产业发展本质是由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决定，农业单一的生产功能向乡村多元价值拓展的结果。从中国的实践看，迄今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49-1978年，乡村产业表现为农林牧渔传统农业发展的1.0版；1978-2003年，乡村产业表现为以乡镇企业大发展为标志的2.0版；2003-2012年，农业观光休闲产业以及“互联网+”等多种新产业、新业态大量出现，乡村产业进入多元发展的3.0版；2012-现阶段，乡村产业的产品供给、文化传承、生态维护等经济和非经济功能凸现，迎来各产业融合发展的4.0版。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

——多元性。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物种、资源等具有鲜明的多样性，加之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农耕文明传承各异。基于不同的资源禀赋衍生出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模式，有的区域主要集中农产品产出，有的区域则注重生态环境维护；有的产业需要规模化生产，有的产业则更强调集约化经营；有的产业不断挤出劳动力，有的产业不断吸纳劳动力；有的产业凸现产品产出功能，有的产业凸现非物质体验过程。区域不同、产业不同、功能不同，多元性构成了中国乡村产业发展又一特征。



——功能性。如同农业功能随不同发展阶段不断演变，乡村功能在不同国家也有不同解释空间。在人少地多的新大陆国家，更多强调乡村的产品产出功能；而在人多地少的国家，则更侧重在产出功能基础上兼具生态维护、文化传承等多重功能。而且，在不同阶段乡村价值也要求有不同表现，早期除了强调产品产出之外，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贡献，甚至农产品出口创汇也是支持工业和城市发展的重要选项。后期则除了物质产出功能之外，同时强调乡村产业的非物质贡献，基于乡村产业发展承担的产品供给、文化传承以及生态维护等功能都具有典型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征，这为对农业采取支持保护的政府行为提供了合理前提。换言之，乡村产业发展的功能性演变决定了农业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

——融合性。乡村产业发展的融合性，不仅仅囿于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密切相关、互融共生，乡村产业发展是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基础，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是乡村产业发展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时代要求，具有互动耦合的内在联系。农业不发展，农民富民不富裕，乡村不进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只是一句口号。因此，发展乡村产业，不仅要促进城乡产业分工协作，合理规划城乡发展空间，更要着眼城乡土地、资金、技术、信息、人才融合互动，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渐进、多元、融合、共享构成了新阶段中国乡村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以促进产业发展，保障农产品充分供给，实现农民充分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传承农耕文明，维护乡村生态环境为价值取向，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释放乡村多元要素，调整政府行为导向，使广大农民群众有充分的幸福感，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乡村产业的深刻内涵，也是各项工作的基本着力点和政策调整基本方向。

## 二、发展乡村产业意义重大

乡村产业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要求，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对稳中求进，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目标意义重大。

1. 发展乡村产业是坚持稳中求进方略的需要。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城乡居民消费持续升级，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需平衡压力持续增加，农产品进口依存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农民非农就业不充分，农民收入增速面临稳中趋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求守住底线，实现区域平衡发展任务艰巨。发展乡村产业，有利于满足城乡居民多元化食物需求，实现农民在乡村充分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稳住农业基本盘，对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至关重要。

2. 发展乡村产业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高质量发展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也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发展乡村产业要服务于以我为主的农业产业安全观，保障农产品充分供给。与此同时，谋划乡村产业类型布局，调整产业结构，

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业转型升级，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内外环境变化相协调，与我国全面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乡村产业发展为拓展农业多元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既满足城乡居民获得充分而多元的农产品需要，又对农业资源环境、生态安全和文化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在全球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比较中，通过乡村产业发展，发挥比较优势突显中国特色，为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寻求突破口。

3. 发展乡村产业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需要。乡村产业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乡村区域空间，释放了乡村活力，产业既涉及农林牧渔等农业本源，又涵盖随经济社会发展无限生成的新产业、新业态。从农业到农村，从生产到生态，坚持因地制宜，因县、因乡、因村施策，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林则林发展的农业产业以及乡村旅游、休闲康养、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对农民在农业内部充分就业，分享效益，增加收入提供了多重保障。既解决了乡村发展的效益问题，也解决了富民增收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不稳定、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的外部环境下，稳就业、促增收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和农民群众的根本诉求，需要把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4. 发展乡村产业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很重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同样重要。防止返贫与脱贫攻坚一样，有多条路径可供选择，但产业可持续发展是最重要前提和最基本选项。脱贫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乡村产业有比较优势，特别是特色产业发展，可以富民、富县、富区域，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持续的成长性。大力推进乡村产业发展，脱贫地区的农民才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保障。因地制宜多元化培育产业、发展产业，让脱贫群众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有利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果更可持续，促使脱贫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夯实区域平衡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5. 发展乡村产业是体现乡村价值的需要。乡村产业发展要促进生态振兴和文化振兴，释放乡村具有的文化遗产和生态维护两大功能。一方面华夏文明几千年生生不息，其重要原因是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从农事节气到村庄布局，无不透视中国独特的文化元素。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农耕文明的载体，耕读文化是中国的软实力。这赋予了我们在乡村产业发展中以农耕文化为魂，通过乡村休闲产业发展、农事体验、民俗文化弘扬等多种方式，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实现保护与开发并举，生产与生态并重。保护好森林、湖泊、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利用好稻田、牧场、池塘等田园风光。在乡村建设中慎砍树、禁挖山、不填湖、少拆房，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实现乡村发展可持续。

总之，乡村产业发展，其本质是农业产业在渐进式演变中的结果，在特定区域和空间格局下的泛化，并重新定义了乡村在新阶段的价值：一是强化乡村的产品供给功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其它经济活动对农产品需求；二是调整农业的要素贡献功能，特别注意发挥各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和释放双重作用；三是增强产业对农民的收入贡献，在乡村内部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四是强化乡村的市场贡献能力，为国

民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最后是凸现乡村对传统农耕文化和维护生态环境的保障功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真正使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 三、发展乡村产业要抓重中之重

乡村产业内涵丰富，其发展的基本方向是，依托各地多元的乡村资源禀赋，适应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要求，形成产业门类合理布局，资源要素有效集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内生动力充分释放，综合效益明显提高的产业体系，建立与城市产业科学分工、优势互补、结构优化、分工有序、协调共赢的新格局。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心来看，乡村产业发展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1. 突出产业稳产保供功能。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支撑，是乡村产业发展第一要义。发展乡村产业要稳住农业基本盘，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既要坚持“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方针不动摇，也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底线思维。一是坚决保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在严防死守耕地数量不减少的同时，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中低产田，挖掘耕地增产潜力。二是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瞄准以生物技术为标志的农业前沿科技，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以提升大豆、玉米单产水平为突破口，打一场种业翻身仗。三是加快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集成、融合、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四是保障农产品充分供给。按照粮棉油糖肉菜果的优先序，合理配置山水田林湖草沙农业资源，以多元供给满足多元需求。五是党政同责抓稳产保供，全面压实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保护耕地，抓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责任担当。

2. 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依托农林牧渔产业发展基础，聚焦有乡村资源优势，有市场需求，能体现乡村价值，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加从业者收入的成长性产业，争取有所作为。一方面，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抓手，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保障供给链，完善利益链，让更多农民分享农产品增值收益。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让乡村成为大家向往的去处，让大家记住乡愁。发展农村电商，让农产品产得出来，卖得出去，能卖上好价钱。通过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拓展产业发展方向，扩大乡村创业就业容量。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中国农业资源禀赋多元，产业类型多元，决定了各地乡村产业发展的目标、重心和突破口不相一致。乡村产业，根在县域，要以县域为时空节点，发展农资供应、技术集成、仓储物流、农产品营销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县域经济，培育“一村一品”、“一县一业”，推动形成地域特点鲜明，业态类型丰富，产业关联性强，利益联系紧密，就业容量大，增收效果好，比较优势明显的县域支柱产业。通过富民乡村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3. 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促进农村消费扩容提质升级。一是改善农村商流物流条件，加快农村物流快递网点布局，解决农

村消费“最后一公里”问题，拉动和刺激农村消费升级换代。二是实施“数商兴农”工程，建设农村数字化流通网络，培训农村数字化人才，推动电子商务进乡村，促进农副产品直播带货规范健康发展。三是推进农产品存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促进“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推动城乡间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对接关系，形成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城乡互动有序发展格局。四是像重视销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一样重视产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像重视网络市场一样重视实体市场建设，在设施用地、信贷支持、安全监管诸方面体现政府行为，形成产销衔接、运行顺畅、各有特色、保障有力的大市场格局。

4. 促进农民充分就业创业。乡村产业发展，要顺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分工分业和充分就业要求。一方面引导农村劳动力持续外出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城镇就业容量，推动形成平等竞争、规范有序、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本市场。全面落实取消县城落户限制政策，实施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平等就业，同工同酬制度。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物流快递、餐饮外卖以及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包括发展家政、养老、护理等生活性服务业。特别是在新形势下，支持发展临时性、非全日制、季节性、弹性工作等多种就业形式，实现农民工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降低就业成本，提高就业效率。另一方面，通过乡村产业发展，积极扩大乡村就业空间。统筹城乡产业布局，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将农产品加工业以及城市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乡村转移，实现城乡产业合理布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大力发展特色乡镇和农村服务业，为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创造空间。深入实施返乡创业能力提升行动，乡村就业创业促进行动，创建农村创新创业和孵化实训基地，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力争让每一个有就业愿望的农民，都能实现充分就业。通过乡村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兜底”向“产业富民”目标转变，使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得到充分保障。

5. 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乡村产业发展中体现文化和生态元素，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一是扎扎实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聚焦农村厕所改造，垃圾分类处置以及面源污染治理等重点问题，深入实施村庄清洁行动和绿化美化行动。二是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统筹处理好产业发展与生态维护的关系，坚决避免重走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大力发展乡村环保产业，释放其在资源回收利用，污染治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充分挖掘具有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民间艺术、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的深刻内涵，加强古村落、农业遗迹的保护，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新产业、新业态。四是守住乡土文化底色，开发乡土文化产品，做精做优乡村休闲旅游业，让乡村成为大家向往的美丽家园。

#### **四、以有力措施保障乡村产业发展**

发展乡村产业要秉承新发展理念，顺应新发展阶段，形成新发展格局要求，提高认识，强化支撑，深化改革，调整政府行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相关政策措施。



1. 提高认识。发展乡村产业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坚实基础，要充分认识到在新形势下促进乡村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工作布局中，把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一是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目标设置和预期要求中，统筹乡村产业发展、生产布局、基地建设、项目安排，构建生产、加工、流通、市场健全的网络格局，体现战略性、纲领性和综合性要求。以县为主，通盘考虑不同层次、不同模式的发展要求，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有所为有所不为。二是始终把产业发展置于乡村多重功能和价值体现的基础地位，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思路 and 模式，提高发展质量，使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目标有机结合，协调一致。三是促进城乡要素平等变换，努力形成城乡产业分工有序、融合发展格局，打牢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础。四是强化乡村产业发展相关责任要求，特别是强化乡村产业发展的稳产保供目标要求，为实现现代化终极目标夯实乡村基础。

2. 强化支撑。乡村产业发展需要全社会高度关注，政府行为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的责任担当，发挥政府在财政税收、金融保险、乡村用地保障方面的积极作用，落实土地出让金收益主要用于农业农村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工商资本参与到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通过政府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补贴、信贷贴息、保费补贴、税收优惠、基金创设等政策引导，激励支持工商资本积极参与到乡村产业发展中来，发挥工商资本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现代性、创新性和示范性作用，促使工商资本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普通农户有机衔接，组织农民、帮助农民、富余农民，让农民群众在乡村产业发展中有充分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3. 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重点领域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不懈的动力。一是土地制度改革要抓“两块地”。一方面推进土地经营权合理有序流转。在坚持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基础上，着眼于稳产保供，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权益基础上，引导农民以转包、出租、入股等多种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形成专业化、区域化、集约化的生产经营格局。另一方面盘活用好农村闲置宅基地。积极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实现形式，在防范风险、权益保障的前提下，丰富宅基地使用权能，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释放农村闲置住房和闲置宅基地多种功能。二是经营制度要有利于乡村产业发展。一方面培育和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注重发展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让普通农户分化成为家庭农场主和合作社成员，由普通农民成长为具有人力资本的职业从业者。另一方面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普通农户在参与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有充分发展，共享共赢发展成果。三是农村产权制度创新要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目标导向，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充分认识到集体经济组织壮大和乡村产业发展在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具有目标逻辑一致性。因此，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注重盘活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拓展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4年第3期）**

# 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黄承伟

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夯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政治责任，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和农民群众积极性，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推动农业基础更加稳固、农村地区更加繁荣、农民生活更加红火，朝着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扎实迈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决策部署，指明了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方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进程中，总结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关键共识，分析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面临的困难挑战，提出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对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关键共识

如何认识及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近年来各领域关注和探讨的关键议题，也是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思想基础。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呈现必然性。从内涵特征看，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指由政府公共服务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的一系列贯穿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综合性服务。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经营者的市场竞争力，涵盖农业技术推广、农资供应、农机作业、农产品加工与销售、金融支持、信息咨询等多个领域。经过数十年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服务产业、服务方式、服务主体和服务对象方面具有多元化特征。第一，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必然要求。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正是其实现途径。第二，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有效抓手。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农业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有效克服了小农生产的低效率和不经济问题，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明显提升。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还有助于农户转入土地，适度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农地经营收入及农户家庭总收入。第三，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解决农村劳动力低质化、老龄化的现实需要。面对农村劳动力的持续流出，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要遏制农村劳动力的低质化、老龄化倾向，就必须强化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减轻农民务农难度，提高农业竞争力。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具有阶段性特征。回顾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历程及政策演进，大致经历了体系

构建、组织发展、机制完善、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四个阶段。服务内容从全产业链转向聚焦于生产性服务，服务主体从村集体扩展至多元经营主体，服务对象由各类经营主体更多地向小农户倾斜，服务形式从多样化形式向农业生产托管逐渐集中。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服务主体更多元，正逐渐由村集体转向市场；服务内容更丰富，逐渐由单一环节向全产业链延伸；服务对象更集中，更加倾向于小农户。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形成了多种运行模式。一是政府主导模式。这种模式以政府为主导，带动了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二是企业指导模式。农户和企业双方通过全产业链的专业化服务，建立稳固的利益联结机制，在“服务规模化”背景下实现农业托管。三是合作社模式。合作社整合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资源，采取集体行动、专业分工等多种方式，促进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在实践中，以上模式并非决然分开，往往存在交叉、融合，但成功的模式必然是能够充分调动地方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企业等各方积极性，立足地区资源禀赋建立的农业服务规模经营方式。

### **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面临的困难挑战**

经过多年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对照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还面临不少困难挑战。

面向小农户的服务组织体系不够健全。比如，经营性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产品品牌化、农产品安全可追溯机制发展严重不足；再如，农村金融服务数量不够、质量不高导致农民贷款困难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多数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内部管理不健全、市场开拓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等问题普遍存在；再比如，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提供服务不均衡，服务供给主要集中于产前、产中环节，旨在节约劳动成本，而产后服务、综合服务相对滞后。此外，服务体系在服务内容延伸及服务领域拓展方面还存在服务能力不足，甚至形成对小农户的排斥等问题。

农业服务供给存在政府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市场机制往往会导致公益性农业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和效率受损。政府失灵体现在经营性农业服务的灵活性不高、公益性农业服务基础薄弱、农业服务的区域协调性不强和统筹规划指导不足等问题。政府和市场失灵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规范的市场竞争机制建设滞后，这是服务组织间存在不正当竞争的根源，导致服务资源分散、服务效率提高受到制约、创新能力不足、监管不到位等，阻滞农业社会化服务可获得性的提升。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存在“部门化”运作倾向。由部门落实或主导、各部门自建服务组织体系的“部门化”，影响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便捷性和高效性。主管部门的条块分割致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主导了农业服务资源配置，导致服务资源配置效率难以达到预期，无法引导更多有条件有意愿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开展经营性服务。“部门化”运作还导致部门之间竞争财政资金，多种服务之间很难自动实现有效衔接，必然对服务效率提高产生负面影响，形成农业公益性服务机构的公益性服务功能弱化等问题。

## 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完善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必须全面深化相关改革，优化推进路径，加快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着力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体。有力有效推进与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多元化社会服务新格局。以农业部门为主，其他部门配合形成合力，以基础性、公益性社会化服务提供为目标，以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为骨干，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为基础。注重处理好招引外部工商企业与孵化本地服务主体的关系，优先把本地的农业服务户、服务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成富有活力的新型农业服务主体。积极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服务主体转型发展，大力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组织成长。

着力强化面向小农户的公益性服务体系。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要注重扶持、帮助处于弱势的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既提供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服务，也提供面向小农户的差异化服务，及时把握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服务需求的演变动态。推动农业公益性服务机构稳定队伍、提升素质，强化公益性服务功能。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奖补等方式，支持各类经营性服务主体参与农业公益性服务。

着力精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经营性农业服务体系由市场主导、确定经营性农业服务价格，依托竞争机制调动农业经营性服务市场的活力。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政府要在公益性农业服务体系的建设与有效供给主导，经营性农业体系建设所需基础条件、法制及市场条件提供，经营性农业服务体系健康发育促进等方面发挥作用。

着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去部门化”，最根本的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而农民组织化的本质内容是农民合作化。各地各部门要逐步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综合性服务组织。因地制宜发展各种类型的服务方式，推行“服务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服务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等组织形式。发挥供销合作社系统优势，创新组织体系和服务机制，增强为农服务能力。

着力提高服务质效。聚焦小农户和农业生产关键薄弱环节，健全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综合服务和专项服务相协调的综合服务体系，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建设并推广普及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平台，精准对接生产与服务的供给端和需求端，高效且便捷地将服务资源延伸至小农户，确保小农户从农业产业链中获益。通过发展全程托管式服务、“互联网+”农业服务、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服务等新兴模式，更好地适应农业规模化经营、科技进步和市场竞争的需求。

**（作者：农业农村部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主任）**



# 加强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标准的研究

贺丽君

尊敬的吉海主席，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我首先对文胜教授的新书出版发行表示热烈祝贺。今天又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研讨会，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想有些研究的方向就我平时思考的这些问题和下一阶段要研究的方向谈谈自己的看法。

## 一、明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脱贫攻坚结束以后，党的“三农”工作的重心历史性转移到了乡村振兴新的时代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把乡村振兴的两条底板底线（粮食就是食物安全）和防止规模性返贫，它是乡村振兴的两条底线，这个定位就凸显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历史地位，在于与乡村振兴阶段的重要作用。

## 二、认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在新的历史阶段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

脱贫攻坚结束以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认识，如何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措施、办法下发得很大。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一样是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我觉得五级书记抓脱贫攻坚的时候确实体现了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但是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认识有很大的偏差，工作有很多的滑坡。所以对如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研究，请大家在这方面要认真研究。

脱贫攻坚以后我们有5年的过渡期，但是我告诉大家绝对不止5年，因为既然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是“三农”乡村振兴的底线，那么它会贯彻乡村振兴的全过程。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就像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中国的小康社会难点就是扶贫，只要扶贫实现以后，小康社会就实现了。整个中国的小康社会没有验收标准，但是扶贫有验收标准，国家统一颁布了验收标准，它是一样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重点难点还是在农村，所以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认识还是不够。刚刚文胜的新书我也看了，我觉得他的思路、路径很清晰，对我的启发很大。我个人理解，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问题上有一个观点，就是要用乡村振兴的标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用脱贫攻坚的精神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该落脚在这方面。

### 三、加强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历史任务中的标准进行研究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脱贫攻坚是有联系，也是有差别的。脱贫攻坚的标准是“两不愁三保障”，巩固脱贫成果仍然要沿用这个提法，就是要体现“三性”。

1. 数目增长的稳定性。农民收入也好，脱贫人口的收入也好，确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在脱贫人口里面 75-80%的收入来自于工资性收入，但现在实体经济下滑以后，很多农民工就业不稳定，大量的返乡，包括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有大幅度的下滑。如何确保脱贫收入增长的稳定性，这是各级党委政府包括专家学者必须要研究的问题。为什么种粮不值钱，别看这是一个表面现象，这体现了农民的主体地位。你种粮食赚钱，如果种粮食超越房地产，那农民还有资格来种粮食吗，那都是房地产老板来种粮食了，农民不可能种粮食了。

2. 三保障，安全饮水的连续性。医疗进行了重大变革，它根本就没有有效衔接，脱贫攻坚的时候是贫困人口的医疗保费可以用财政补贴 50%，甚至 100%。医保出台文件以后，出现返贫以后可以实行补贴，我说你们理解不深入，我们是防止返贫，你还出现返贫以后才给他医疗补助，不是搞反了吗。例如安全饮水，有些地方投机建水厂，现在水质不行，管网维修不行，这些东西都是连续性的。

3. 脱贫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要细化脱贫人口的内生动力，有很多事情不能包办，下一步要改变内生动力，就是要加大培训，提高他们的生存技能，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引导。路径问题就是监测和帮扶。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里面一个最新的提法就是建立覆盖农村人口的监测机制。原来主要是设立到脱贫人口的建设机制，首先是防止返贫。这个监测量是海量的，怎么建设这个机制，那天我跟社科院讲了一下，我说你们能不能搞一个重大课题，来研究一下怎么建立覆盖农村人口的动态监测机制。他们列了一个重大课题，是由农大来研究承担。要把有返贫风险的人找出来然后施策，及时帮扶。另外，要有针对性，缺什么补什么。

### 四、在新的要求下如何改进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有些领导干部对“三农”工作的有效衔接讲得很多，但真正对本县如何实行巩固脱贫攻坚的乡村振兴，这五大中心怎么实施思考不多、研究不多。对基层干部实现一种在减负的状态下，不要躺平，不要内卷，有些乡镇干部、基层干部，包括村干部，现在没有检查督查，也没有督查任务了，他不知道干什么，没有方向感。我说你们减负不减责任，减负不减压力，减负不减要求，减负也不减你和农村群众的联系。

（作者：湖南省农业农村厅原党组副书记，本文系作者于 2024 年 12 月 8 日在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讨会上暨陈文胜教授《中国乡村现代演进》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

# 以新产业新业态引领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刘璐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新产业新业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增收。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必须锚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积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努力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依靠创新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和业态模式，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实现了较快发展，繁荣了农村经济，促进了农民就业和增收。

新产业新业态有效拓展了乡村产业空间。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注重挖掘乡村多种资源要素，着力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全环节增值，加快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乡村休闲旅游业等，推动乡村产业融合水平不断提升，促进了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2024年，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加快升级，新建50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4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认定333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2024年1月至6月，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7万亿元。通过立足乡村农业、文化、生态等资源，积极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不仅拓展了农民就业增收渠道，也有效拓展了乡村产业发展空间，增强了产业韧性。

科技创新赋能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近年来，随着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在农业农村领域加快应用推广，尤其是在现代种业、农机装备、农产品精深加工等关键环节提供科学技术支持，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步伐明显加快，智慧农业、农村电商等业态蓬勃发展，促进了乡村产业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现代化，加快了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村域经济、庭院经济、订单经济，以资源禀赋蓄积发展动能，做大做强做优特色产业。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农业生产向智慧种养转变，种养、施肥、灌溉等作业精准度明显提高，从而有效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电商迅速发展，打破了乡村产业商品价值实现的地域限制，特别是为“土特产”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加快向养生养老、现代精品民宿、乡村智慧旅游等方向发展，“农业+加工流通”、“农业+康养”

等推动中央厨房、康养农业等业态发展。

乡村特色文化助力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依托乡村产业发展，乡村优秀文化传承发展更好地体现时代价值、增强生命力。立足当地乡村文化资源禀赋，通过要素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以及乡村文化的功能拓展与价值创新等，积极培育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着力推进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创新供给文化旅游路线、文化主题民宿等乡村文旅产品和服务，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拓展乡村研学、文化体验等新业态，方便游客看古建、访遗迹、寻根脉、品文化。推进建设非遗体验基地、农耕文化展馆、生态园文化基地、红色文化体验基地等，为城乡居民提供沉浸式文化体验，推动乡村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特色文化产品、服务与业态。“村BA”、“村超”、“村晚”、“村舞”、“村咖”等“村字号”IP涌现，带来的巨大线上线下流量，不仅培育了乡村文体产业，还推动了乡村露营、康养等旅游新业态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运用动漫、数字艺术、网络文学、直播带货等方式，多形式开发乡村优秀文化资源，创作传播展现乡村特色文化的数字文化产品，丰富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 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3个字琢磨透。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找准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的切入点着力点，注重科学规划、立足特色资源、紧盯市场需求，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立足特色资源分类施策。乡村产业发展的关键是用好一方水土，开发乡土资源，在突出优势和特色上下功夫。形形色色的农副产品，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都是乡村产业发展的独特土壤和天然优势。要科学把握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区域差异大的实际，紧紧依托各地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因地制宜选准产业发展的类型和突破口，分区域、分类型、分重点推进，着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切实把乡村资源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当前，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就是依托绿水青山、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等，发展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乡村产业，更好彰显地域特色、承载乡村价值、体现乡土气息。

紧盯市场需求形成优势产业。乡村产业发展要关注市场需求，立足当地产业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始终坚持城乡融合、协同发展的系统观念，坚持改革创新，加快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加快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有序流动，多措并举加快乡村产业发展。在推进产业融合上下功夫，贯通产加销，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流通业，提高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促进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推动农村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融合农文旅，加快发展面向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现代乡村服务业，包括发展乡村餐饮购物、文化、旅游休闲等生活服务，推动农村由卖产品向同时卖服务转变。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精准发力，促进更多的“土特产”

成为大产业，推动乡村产业发展行稳致远。

坚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乡村产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使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同步，坚持生产向绿、品种向优、品质向好，正确处理速度和质量、发展和环保、发展和安全等关系，积极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切实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产业发展之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农民之所想，把工作着力点放到解决当地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上，让农民群众在乡村产业发展中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使乡村产业发展成为改善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基础。坚持以城乡融合带动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加速融合，使乡村产业发展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抓手。

### 三

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必须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做强农产品加工业，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加力推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坚持产业兴农，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促进共同富裕。当前，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在突出优势和特色上精准发力、持续用力，做精做优乡村特色种养业、特色手工业、特色文化产业，全链条推进乡村产业升级，发展乡村产业新质生产力。以农民为主体，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着力推动优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积极培育壮大现代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乡村休闲旅游业、乡村新型服务业等，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关注市场需求，持续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加快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在农村电商、休闲农业等领域精准发力，推动乡村产业业态更丰富、市场竞争力更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乡村体系建设，加大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力度，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科技成果大面积推广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乡村产业新的竞争优势。

坚持质量兴农，推动乡村产业优质化品牌化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质量管控是乡村产业品牌的生命线。乡村产业发展要走得稳、行得远，必须坚持做质量、强品牌。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乡村产业链各环节加强质量管控，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标准化生产、品牌打造等方面，既要“深耕”，也要“细作”，进一步擦亮乡村产业物美价廉的“金字招牌”。坚定不移突出优质、安全导向，继续调减低质、低效和不对路品种，增加紧缺和优质产品供给，完善产品监管、质量检测和质量溯源体系，构建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持续加强乡村产业品牌创建，创响一批“乡字号”、“土

字号”品牌，打造一批品质好、有口碑的乡村产业“金字招牌”。切实摆脱靠资源禀赋“卖原料”、“卖初级产品”的被动局面，聚焦产地加工、冷链物流、品牌建设等薄弱环节，持续推进生产、加工、流通、营销产业链升级，加强质量管理、市场营销，提升乡村产业发展质量和整体效益。

坚持绿色兴农，推动乡村产业全面绿色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要在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上下功夫。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底色。要在推动乡村产业绿色发展上久久为功，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聚焦产业布局、资源利用方式、生产管理方式等方面改革创新，积极探索绿色发展模式，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真正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按照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要求，在确保生态系统功能不被破坏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多元价值，用足用好乡村丰富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一批具有本地特色的绿色产业、生态产业，在产业发展中切实保护好利用好乡村的绿水青山、田园风光、自然风貌，真正实现“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的转变。以节能减排、提质增效为目标，对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流通和消费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解决好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污染问题，推广应用清洁生产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更加自觉地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要求落实到乡村产业链转型升级之中，坚定不移推进生产向绿、品种向优、品质向好，提高产业链价值，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提升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持联农带农，推动乡村产业更加富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发展乡村产业要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下功夫，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尽可能让农民参与进来，确保广大农民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通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参与并分享乡村产业发展的收益，让当地农户腰包真正“鼓起来”。进一步完善产销衔接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对接关系，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深入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着力构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产销精准对接的机制，确保农产品产得出、供得上、不断档。积极发挥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联农带农惠农方面的作用，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多种类型的合作机制，让农户分享加工、销售等环节收益。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通过产业拉动、就业带动、改革促动，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让农民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生活更加红火。汇人才、聚人气、凝人心，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群众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创造性，鼓励和引导乡土人才等在乡村兴业创业，为推动产业兴旺增动力添活力，共同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绚丽篇章。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 新中国 75 年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推进

郑有贵

**摘要：**新中国 75 年间，农业农村农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取得历史性进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推进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奠定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基础，农民农村向共同富裕演进奠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基础，农村既塑形又铸魂全面发展奠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的基础，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奠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基础，农业农村发展促进全球粮食危机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奠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基础。新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之所以能够取得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进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推进贡献力量，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把握现代化规律，在工业化进程中夯实农业农村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补农村短板，在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程中解决农业短板问题，形成了动员全党全社会破解“三农”难题、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关于新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成就的研究，是学界持续关注的课题，在新中国成立 40 周年、50 周年、60 周年、70 周年之际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已有研究聚焦于农业产出能力提升、农村建设、农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改善等，较清晰地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农”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如果仍按此思路总结新中国 75 年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成就，难以避免重复研究，最新重大实践和理论发展也不能充分呈现。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视域，用正确的党史观、大历史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对新中国 75 年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展开研究，以期在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提供借鉴。

## 一、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奠定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基础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重点难点在促进规模巨大的农民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其原因有：一是千百年来以传统农业维持生计的中国农民，在生产发展上受生产力水平低下限制，在生活上受到温饱问题困扰。20 世纪 30 年代不少有识之士发起乡村建设实验，起因就是认识到农民生产生活的低水平困境。二是在存在城乡差别和农民文化素质低、农业科技力量弱的情况下，推进数量巨大的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任务艰巨。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农民为 48402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89.4%。三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发展受弱质性困扰。这些因素都使推进规模巨大的农村人口实现现代化困难重重。面对农民生产生活的低水平困扰，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全局出发,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发挥农民主力军作用和成功走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经验,发挥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攻坚克难,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解放农民”和致力于推进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探索基于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比高的现代化路径,农民自立、素质提升、发展空间拓展,由传统向现代演进取得历史性进展。

自立。现代化的推进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人这一最活跃的因素,其中包括数量巨大的农民。新中国成立前,占全国总人口近九成的农民受压迫和剥削,现代化的推动缺乏来自农民的力量,这是约束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如何突破农民生产生活困境,中国共产党和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实验者的主张是不同的。要不要改变农民被压迫的政治地位和受剥削的经济困境,是中国共产党与乡村建设实验者在解决农民问题路径上的区别。乡村建设实验者主张在不改变当时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治理“愚、穷、弱、私”等让农民走出困境。乡村建设实验者动员多方面资源推动的乡村建设,在提高农民素质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上有所成效,但不能持续,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受压迫和剥削的问题,因而即便是小范围的试验也没有持续下去。中国共产党主张要首先解决农民经济和政治翻身得解放的问题,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的方式聚集改变受压迫和剥削状况的力量。在封建社会,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基于土地私有制的小规模自耕农和依靠租佃地主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佃农等小农摆脱不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以及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的垄断势力的剥夺。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民不仅没能摆脱封建统治及地主阶级剥削,还要遭受帝国主义掠夺,生产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按照1950年6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推进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夙愿得以实现,农民从地主阶级主导的经济中解放出来,实现经济自立,并以此为基础,参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确立了农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凝聚起农民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力量。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翻身解放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基石。以此为基础,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日益展开。

素质提升。新中国成立前,农民不得温饱,上不起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文盲率超过95%。农民缺乏科技文化素养,难以立足,终归会被现代化所淘汰。中国共产党为了促进农民的自立自强,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让农民翻身,还推进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提升农民内生发展能力。新中国从各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尽力推进农村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促进农村人文发展水平提升。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之前长期开展扫盲运动的基础上,在全国开展扫除文盲运动,并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农民学习文化、科技的积极性高涨,击破了农村的沉闷。在发展人民教育进程中,城乡教育事业共同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事业从无到有,实现义务教育全覆盖。在发展人民卫生事业进程中,国家和集体共同推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合作医疗从无到有,大病统筹全面实现。对农民进行新技术培训持续开展,促进由靠传统经验种养转变为科学种养。75年间,中国农民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文化科技素质,都实现大幅提升。农民素质的提升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一方面体现在其本来就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提升了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强了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内生能力,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

发展空间拓展。新中国农民发展空间的拓展实现历史性突破。新中国成立前,农民滞留在农村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和传统手工业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发展空间的拓展是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展开的。工业化及城镇化的推进,与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共同作用,农民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工业化、城镇



化的推进和农民素质的提升，不仅为传统农业农村向现代农业农村拓展提供了条件和空间，还拓展了农民向城镇发展的空间。在拓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从事农业的农民，不再是传统的农民，有的日益成为掌握现代科技的职业农民，发展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发展农村电商；有的在国家引导和集体主导的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由单一从事农业生产转向参与农文旅融合发展。在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拓展方面，一大批农民外出就业创业，从事非农产业，再到转变为市民。2023年全国城镇人口增加到93267万人，城镇化率提高到66.16%，比1949年的10.6%提高55.56个百分点，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降至2023年的33.84%。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中国农民不是被资本挤出，而是随着素质的提升和城镇对农业转移人口承接能力的提升，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所致。

由上可见，75年间，中国共产党确立农民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乃至国家现代化中的主体地位，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取得历史性进程，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探索推进贡献了力量。

## **二、农民农村向共同富裕演进奠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对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解决的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和城乡差别较大的问题，致力于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和城乡协调发展，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和分享现代化成果，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上取得实质进展。

农民农村向共同富裕演进。在农村人口规模巨大的情况下，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领导农民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因为要帮助农民解决在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下生计难、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有了生计基础。为避免历史上土地私有制下贫富两极分化现象的发生，中国共产党趁热打铁，1953年起至1956年引领农民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通过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实现农村土地由农民所有到农民集体所有的制度变革。尽管之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历经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1962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坚持不变。实践表明，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既避免了农民土地被资本并购及导致农民被挤出到城市贫民窟现象的发生，也避免了农民因为失去土地导致农村两极分化现象的发生，成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石。基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中国在实践中探索拓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路径：一是在基于土地集体所有的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下，解决了农户在土地改革后面临的生产资料短缺问题，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促进了1958年起的社队企业及1984年起的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些集体经济的发展又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社会保障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二是在实行家庭承包经营改革后，在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还基于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民合作社，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地方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探索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共同富裕之路。三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及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还成为农民外出就业创业的保障，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外出就业的农民回到家乡利用承包地顺利渡过困境。

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和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城乡差别自古有之。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差别不仅缘于分工、工农劳动生产率差异，还缘于“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新中国因为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需要将农业剩余更多转移到工业，使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的难度更

大。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在采取措施避免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为目标，构建避免城乡对立的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城乡协调和共同繁荣发展的措施。一是改善工农收益分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既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实现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又尽可能提高农产品价格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在1992年起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中，对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价格实行支持政策，以保障农民获得基本收益；进入新时代，中国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程中，构建包括农民在内的各方分享发展成果的利益联结机制。二是把发展农用生产资料作为工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的发展为农业农村提供现代农业生产资料 and 为农民提供现代生活资料。三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拓展乡村产业发展空间。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农业单位产出量和产品质量都实现大幅度提高，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规模提升。仅以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为例，2023年是1949年的5.68倍。另一方面，在很长时期内促进社队企业及之后的乡镇企业发展，进入新时代通过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升乡村资源价值和发挥乡村的多种功能，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四是在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来后，在推进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同时，促进农民就业非农化和推进城镇化快速发展，增强城镇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能力，逐步减少农民数量，为农民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拓展增收空间创造条件。五是确保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集体宅基地的使用权，以及通过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使农民有了财产收益。这些都促进了农民增收。经过长期努力，从2010年起，中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由城镇高于农村转为农村高于城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由历史最高的3.14（2007年）缩小到2023年的2.39。中国共产党动员全社会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中国历史性解决了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亿万农民迈进全面小康社会，树起新的历史丰碑。

由上可见，在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引领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乡协调和共同繁荣发展，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和分享现代化成果，支撑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推进。这是新中国能够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 **三、农村既塑形又铸魂全面发展奠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的基础**

新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史，是一部农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的发展历史。新中国自成立起，没有跟随资本主义以物为本的现代化之路，而是从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和本国的实际出发，既推进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又推进社会主义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废除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族权、神权、夫权及与之相应的习俗，以此为基础，农民组织业余剧团、秧歌队、高跷队、龙灯队等开展文艺活动，表达翻身喜悦和增加生产愿望，促进了剥削可耻、二流子懒汉可耻、劳动发家致富光荣等新道德风尚的树立，在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同时促进农民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化。进入新时代，在持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传统乡村文化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日渐消退，乡村缺乏聚集力和精神动力的问题，提出“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优秀乡村文化能够提振农村精气神，增强农民凝聚力，孕育社会好风尚”，“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这些重要论述回答了如何破解农村人气低落，进而重铸乡魂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问题。2021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专章对促进乡村文化繁荣作出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经过 75 年的探索实践，中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是文化由下乡向城乡融合发展演进。这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演进。新中国工业化初期促进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进程中，城镇支持带动农村文化发展，为农村提供从小学到高中的教师、教材、教学器材等教育资源支持带动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持续推动电影、戏剧、图书、科技下乡。21 世纪初期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起，国家通过公共财政支持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进入新时代，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将文化振兴作为其重要内容，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注重承载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人文环境和人文精神的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利用，避免传统乡村文化的消退，使人们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能够记住乡愁，单向的文化下乡向城乡文化融合发展演进。

二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了农民精神生活和促进了乡村文明发展。新中国探索形成党领导的德治与自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农村向善向上。在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建立村规民约、积分制等促进文明乡村建设，促进天价彩礼、人情礼金及因婚致贫问题的解决；设立和连年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农民在自发组织开展充满农趣的村歌、“村晚”、运动会等活动中重铸乡魂。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民精神生活的丰富、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使乡村更具魅力和凝聚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精神动力。

三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是自古有之的认知。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也随着绿色发展的推进，农村日益朝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发展，农村不仅是农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还是城镇的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后花园。具有深厚农耕特质、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不再沉没，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精神文明建设由单一的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演进为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结合。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农村休闲、观光旅游、康养和研学，满足了城乡居民对农耕文明、乡村文化、自然生态等消费日益增长的需求。乡村产业发展与乡村文化建设融合发展，促进了长期存在的要素单一由农村流向城镇困扰农村发展问题的解决。这种资源在城乡双向流动的城乡融合发展，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体现。换言之，新中国将农村物质文明单向作用于精神文明转变为双向作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农业农村发展赋能，促进承接城镇赋能乡村振兴能力的提升，促进了城乡互促互补和共同繁荣发展。

由上可见，新中国 75 年推进农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促进了农村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推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展开，赋能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成就了农村的和谐进步，以此为基础，也成就了整个国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的推进。

#### **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奠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基础**

新中国 75 年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的历史。工业化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矛盾突出，资本逐利引发严重危害生活的环境公害事件。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的中国，尽管以追赶世界工业化进程为目标，也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尽可能避免发生工业化先发国家在生态环境上先污染后治理现象的发生，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自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多方面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一方面，积极推进绿化祖国和水土保持工作，探索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农业技术路线。新中国自成立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推进绿化祖国和水土保持工作。1958年毛泽东指出：“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毛泽东还基于中国传统农业经验和农业科技水平总结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技术路径，提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项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简称“农业八字宪法”），“农业生产必须依靠有机肥料，有机肥和无机肥料相结合”，并警告“光靠化学化来得到稳定的丰收，有危险”。

另一方面，在发展中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探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但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而是正视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积极应对。早在1973年8月5日至20日，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决定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并制定了与之相对应的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之后，中国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面对农业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积极探索解决之策。

一是随着粮食短缺问题的缓解，推进退耕还林还草还湖，以改善生态。新中国的工业化是在粮食人均产量300公斤左右这样一个较低的农业产出水平上展开的，加之人口大幅增长，长期面临粮食供给短缺问题。从解决粮食基本供给出发，改革开放前国家一方面通过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保障低水平限量供给粮食秩序，另一方面强调以粮为纲，用部分林地、草地造田，围湖、围海造田，在坡地种粮，这些解决粮食短缺的做法造成部分地区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国家自改革开放初期采取增加进口粮食的措施，加之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实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粮食供给紧缺问题得以缓解，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20世纪90年代末国家调整政策，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二是随着农业科技水平的提升，从改善农药、化肥、塑料薄膜等投入品质上减少生态环境污染。在农药生产技术低的情况下，中国只能生产和使用高毒农药，如六六六杀虫剂；随着农药生产技术的提高，低毒、无毒、生物农药替代了高毒农药。在肥料上，实施配方施肥既提高施肥的针对性又减少施用量，并施用有机肥。在塑料薄膜上，实现可降解对不可降解的替代。同时，面对规模养殖导致粪便污染环境的问题，在发展家庭户用沼气的基础上，支持养殖场发展大型沼气，在实现粪便清洁化利用的同时，还实现了粪便的能源化利用。

三是引导农村工业减少污染。一方面，通过规划、政策等措施，引导农村工业向小城镇和产业园区集中。20世纪50年代，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倡导工农业并举，在农村发展工业，农村社区集体统筹和积累机制又为农村工业发展提供了所需资金，农村在计划经济外发展“五小工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搞活政策的实施，一段时期工业散落农村（当时形象地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加之在技术上乡镇企业落后于国有企业，粗放经营，导致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环境污染严重。面对这一问题，中央和各地采取积极措施减少农村工业污染，包括在布局上引导、支持农村工业与小城镇结合和向产业园区集中，在技术上实施国家“星火”计划帮助乡镇企业提高技术装备水平。

第二个阶段，进入新时代，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指引，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推进农业

农村生产生活绿色化。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包括“绿色”在内的新发展理念。2017年7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时指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9月印发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2017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推行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党的二十大在部署乡村全面振兴时要求推进生态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坚持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在促进生产绿色化上，针对约束乡村振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对山水林田湖草实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促进过度消耗资源发展方式的改变，对东北越来越薄的黑土地实施修复行动计划，解决重金属污染土地和华北地下漏斗区问题，促进市场化多元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健全，提高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解决化肥、农药过量使用问题，促进废旧地膜回收处理，提高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农田残膜资源化利用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显著提高。据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0》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3》显示，全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由2012年的73.46提升至2022年的77.90。2022年，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的绿色发展指数平均为80.4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由2012年的0.516提升为2022年的0.572。2022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总量为5079.2万吨（折纯），连续7年呈下降趋势；秸秆综合利用率保持在86%以上，秸秆离田利用率为35.8%；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为78%，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在97%之上。

在生活绿色化上，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推进农村“厕所革命”。2018年3月，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作出部署，同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扎实推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对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提升五年行动作出部署，要求建设一批有机废弃物综合处理利用设施，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城乡环卫一体化第三方治理，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和美丽庭院示范创建活动。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二〇二二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就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作出进一步安排。2003年起浙江省实施的从农村环境整治入手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由点及面、迭代升级，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

由此可见，中国在处理农业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上，经历了在发展中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下促进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绿色化，推动由农业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矛盾向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产业振兴统一的转变，把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统一起来，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绿色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探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了力量。

## **五、农业农村发展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问题的解决奠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基础**

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不仅不制造世界粮食危机和生态环境危害，还积极促进世界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解决，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以粮食基本自给为粮食安全观，致力于把饭碗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做出重要贡献。粮食安全是和平发展的基础。中国对于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没有采取制造世界粮食危机的行径，而是提出了促进世界粮食安全的中国方案，并为之付出努力。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粮食短缺期间，采取多种措施，在生产上促进粮食生产发展，在流通上采取统购、凭票证低水平低价格配额供应，保持了人均粮食产量在安全线下的粮食有序供给和基本消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及其他食物产量进一步增长，到 2023 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提高到 493.3 公斤，高于国际上公认的粮食安全线人均 400 公斤。同时，中国“光盘行动”得到全社会响应，珍惜粮食、反对浪费氛围浓厚。经过这些艰辛努力，中国用全球 9% 的耕地资源解决好了全球 1/5 人口的吃饱吃好问题。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的成功实践，本身就是对全球粮食安全做出的重大贡献。

不仅如此，中国积极推进全球粮食危机的解决。中国在全球粮食治理领域，坚定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致力于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履行，呼吁各国保持粮食贸易开放，敦促单边制裁的取消，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要求发达国家削减扭曲农业贸易的超额补贴，为发展中国家留下政策空间。2021 年 9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将粮食安全纳入八大重点合作领域。将粮食安全纳入重点合作领域，致力于推动全球各方优势互补，以汇聚实现粮食安全合力。

援助发展中国家克服饥荒困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突出表现在不殖民，不以大欺小，而是兼济天下，对发展中国家雪中送炭，实施农业援助。中国在实施援助时，秉持“受援国提出、受援国同意、受援国主导”原则，因国施策，推广农业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贸易等技术，真诚帮助受援国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中国在还没有进入富起来的发展阶段，尽管粮食短缺，仍急人所急，授人以渔，向发展中国家实施农业技术援助。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业援助从 1953 年已开始，在 20 世纪 60 年代按照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对 30 多个国家实施农业援助，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后进一步扩大农业援助。中国农业对外援助项目，由 1953—1966 年的 19 个，增加到 1967—1978 年的 127 个，派出农业专家高峰年达 1800 多人次。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的 40 多年间，中国向亚洲、非洲、美洲的 80 个国家和地区推广杂交水稻种植技术，培训大量杂交水稻技术人才，促进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高。中国逐步加大对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支持，2004 年中国政府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印度洋海啸灾区灾民提供食品援助。中国于 2005 年底停止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表的 2005 年度国际粮食援助监测报告显示，中国在这个年度援助 57.7 万吨粮食，占当年全球粮食援助总量的 6.9%，为仅次于美国、欧盟的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方。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南南合作上开展战略合作，2009 年设立了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计划，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框架下援助资金、派出专家、开展项目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非洲启动建设 13 个农业发展与减贫示范村，帮助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

推进绿色发展贡献。中国不同于一些发达国家从自己利益出发向外输出垃圾、破坏全球生态，而是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类共同家园出发，积极推进全球绿色发展。中国几代人持续绿化祖国，实现由“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2004 年后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连续 3 个监测期缩减，

森林面积、森林蓄积连续 30 年保持增长，绿色面积不断扩大，提前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关于制止和扭转土地退化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完成造林种草 11.73 亿亩，其中造林 9.6 亿亩，森林覆盖率为 23.04%（比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的 2009—2013 年结果高 1.4 个百分点），森林蓄积量达 175.6 亿立方米。美国航天局卫星数据表明，2000 年至 2017 年全球新增的绿化面积约 1/4 来自中国，贡献率居全球首位。2017 年 12 月 5 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向献身绿色事业的河北塞罕坝建设者颁发联合国最高环境荣誉——“地球卫士”奖。2020 年 4 月 22 日，陕西省榆林市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 93.24%，陕北地区由“生命禁区”转变为“塞上绿洲”，表明毛乌素沙漠即将退出陕西版图。

不仅如此，中国除切实履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环境公约外，还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中国为全球绿色发展提供了更多公共产品，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2019 年 4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以“绿色生活，美丽家园”为主题的“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延庆区成功举行。中国积极倡导并推动将绿色生态理念贯穿于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给予力所能及的资金、技术帮助，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才互动交流，促进沿线国家环保意识和环境管理水平提升，推动绿色“一带一路”的共同打造。

综上所述，新中国 75 年间，农业农村农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取得历史性进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推进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基于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比高的国情，新中国促进农民自立、素质提升、发展空间拓展，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取得历史性进展，奠定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基础。面对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解决的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和城乡差别较大的问题，新中国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城乡协调发展，奠定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基础。新中国摒弃以物为本的现代化，在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既塑形又铸魂，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的基础。自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中国从多方面破解农业农村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进入新时代，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指引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推进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绿色化，把实现生态美、百姓富统一起来，奠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基础。新中国既促进农业农村发展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又积极促进全球粮食危机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奠定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的基础。新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之所以能取得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性进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推进贡献力量，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把握了没有农业现代化、农村繁荣富强、农民安居乐业则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这一现代化规律，从实现国家现代化全局出发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基于经济社会所处发展阶段发挥政府和市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作用，在工业化进程中夯实农业农村基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补农村短板，在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程中解决农业短腿问题，形成了发挥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动员全党全社会破解“三农”难题、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的探索形成，回答了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如何基于“大国小农”的国情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命题。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合作经济学会副会长。参考文献省略。载于《江西社会科学》）

---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科院机关及各研究所、中国食药促进会  
发：中国食药促进会秘书处及各部门、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毛振宾  
副 主 编：谢久忠 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